



世界语者们

黄石市世界语协会

ESPERANTISTOJ

世界语者们

——因为凡几个世界语家，都超
乎口是心非的利己主义者之
上。

鲁 迅

黄石市世界语协会编

1983年3月

目 录

世界语工作很有希望

——一九七九年八月在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

上的讲话	胡愈之 (1)
忆陈毅副总理对世界语工作的关怀	李奈西 (4)
哥本哈根去来	陈 原 (7)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李奈西 (15)
“乌托邦”的追求者	叶君健 (18)
处处充满友谊	刘 铃 (26)
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有感	巴 金 (30)
世界语与文学	徐声越 (34)
关于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的一些回忆	张企程 (39)
回忆语联 (节选)	叶籁士 (46)
忆中国人民的战友绿川英子	戈宝权 (56)
王再天同志与世界语	崔国庆 (64)
“我永远爱你”	史 平 (65)
世界语者——许寿真	(67)
“世界语给青年带来世界”	

——访朱九思同志

晓姜·绿野 (70)

可敬的执炬者

TIKOS油印丛书活动

Zucento (74)

“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用在世界语上”

——访陈老

林力源 (79)

世界语——友谊和文化交流的桥梁·····	卢剑波 (82)
我和世界语·····	周 尧 (85)
第一个获奖者·····	古 木 (88)
使用和为世界语的二十三年·····	苏阿芒 (91)
陋室吐芬芳	
——访王崇芳老师·····	林力源 (100)
秉笔忆征程·····	胡国柱 (103)

世界语工作很有希望

——一九七九年八月在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胡愈之

我是一九一四年学世界语的，到现在还能讲两句，说明世界语并不难学。当时我是个学生，学了两年英语没有学好，遇到了困难，后来听说世界语容易学，就试一下。学了世界语再学英语，进度就比较快。后来我感到，世界语不仅容易掌握，它本身还可作为国际文化交流的工具。因为世界语是一种比较科学的语言，发音和语法比较规则，所以容易学，我学了几年就有用处。

中国的世界语运动搞了五六十年，没有很大发展，中间走了一些曲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对世界语非常重视，没有党的领导，世界语在中国不可能发展。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重视世界语，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都支持世界语。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世界语者，但党和政府这样重视世界语的，恐怕只有中国。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许多革命同志在监牢里学世界语，因为通过世界语，可以看苏联出版的许多世界语书籍。俄语不但难学，而且容易引起人们（指国民党反动派——编者）的注意。日本的世界语者绿川英子，大家都知道吧，她支持我们的抗战，用世界语向全世界宣传我们的民

族解放斗争。全国解放后，成立了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创办了《中国报道》。我觉得世界语重要，世界语工作很有希望。我们要向前看，看到将来。

世界语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它是国际普通话。毛主席曾说过，将来实现了共产主义，各国之间来往更密切了，甚至国家都没有了，那时的问题就是讲话的困难。到那时，我看就要掌握世界语这个普通话。就象我们中国以前不统一，各地有各地的方言。现在国家统一了，语言还没有统一，所以我们的教育部要推广普通话，但至今还没有完成这一工作，要在国际上推广世界语，应是个长期的事情。上次开会（指一九六三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编者）以来，已经十多年了。当时陈毅同志讲了话，有一点我还记得，就是世界语可以搞，应该搞，但要细水长流，不要性急。认为世界语在全世界可以马上推广，世界语到哪里都可以用，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当然，我们每年可以参加一次国际的世界语大会，但还不能在国际交往中把世界语作为唯一的语言工具。但是总会有一天，到了共产主义或者世界实现和平时期，那时世界语就会有一个大发展。

许多外国朋友认为，中国的语言最难学。许多朋友希望到中国来了解中国的情况，要有翻译。有的翻译容易找，有的翻译就难找。所以我们有义务，不仅在国际上推广世界语，还要在国内推广世界语。现在我们搞“四化”，要同世界各国人民来往，引进各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要大大发展我国的旅游事业。所以搞世界语是实际需要。

我们有了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各地还成立了世界语组织，进行一些活动。现在我们有一千多人，两三年后可发展

到一万人，五六年后可发展到五、六万人。到那时候，大中学校里可以设立世界语专科，培养年青人。我们在座的大部分是年老的，我们要把世界语传给下一代。

我在世界语方面贡献很少。但望我们的事业，一天天发展。毛主席讲过：“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么，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这番话给我们指出了方向。希望大家 坚 持 努 力，多做实际工作，与外国朋友通信，多参加一些国际世界语会议。这些都是应该做的。

（摘自《中国报道》杂志1979年第12期）

胡愈之：第六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

忆陈毅副总理对世界语 工作的关怀

李奈西

一九六三年七月下旬，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在北京举办了全国世界语工作成绩展览，同时召开了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邀请陈毅同志前来参加。

陈毅同志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工作很繁忙，可是他从百忙中抽身前来参观了我们的展览。在参观的过程中，他以平易近人的态度，耐心地倾听世界语协会负责人的解说。当他听到国外读者对我国的反映和向我们刊物提出改进的意见时，连连点头说：“好！好！你们做得好。”我们还向他介绍了国外出版的世界语书刊，他对于国外出版的有些古典文学著作的译文达到原作水平时，表示惊讶。他说：“世界语有这么丰富的表现力，真没有想到！”当谈到我们将《鲁迅小说选》的世界语译稿寄给国外著名世界语作家征求意见时，他表示赞赏这种作法。

七月二十五日，世界语工作座谈会举行开幕式，陈毅同志到会并在会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那天参观了世界语展览会，“使我的知识增加了一分，眼界扩大了一分。”他认为，可以将这个世界语展览送到各省市去展出，给各地的同志也看看，象他一样增加一分知识，扩大一

分眼界。

他对于这几年来我们的世界语工作的成绩表示赞赏。他说：“世界语工作我很佩服。这个部门的工作不是可有可无的，是必须做的，要大发展。”他建议要把各大城市的世界语组织成立起来。

陈毅同志表示不同意有些人批评“世界语是改良主义运动”。他说，世界语工作很有意义，它可以消除种族、宗教的成见。他还说：“我们不是反对一切改良，只反对那种帝国主义的给你一点吃的你就为他效力的那种改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有欺骗性，它取消革命，我们反对。但革命的改良，可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他说：“那些左倾空谈的做法我不赞成”。

陈毅同志还十分关心《中国报道》杂志，他建议我们的刊物应多登一些有趣的东西，如诗歌、散文、生活报道、新事物的介绍、科学知识等等，使读者看了我们的刊物以后感到有兴趣，愿意阅读。在他的热情关怀和积极支持下，《中国报道》从一九六七年开始，由双月刊改成了月刊。

陈毅同志在谈到国际世界语大会时说。可以考虑在北京召开国际世界语大会，欢迎各国世界语者到北京来开会。为了在北京举行世界语大会，就要切实做好世界语工作，这样大家来开会就好了。那时各国世界语者到各地参观，不单看中国建设，还可以看我们的世界语工作。

陈毅同志对我们今后的世界语工作提出了要求。他说，要搞，就要专、精。我很同意一部分人专搞世界语。这批人中文要好，世界语也要好。他还鼓励我们说，要脚踏实地作工作，有了成绩，对人民就会有贡献。他要我们好好培养一

批年轻的世界语者，要把世界语世代代传下去……

陈毅同志的讲话，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为了实现他的愿望，中华世协得到教育部的同意，于一九六三年冬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了世界语班，训练世界语教师，以后这批教师到全国十一所大学开设了世界语课。一九六四年秋天，又从全国各大学外语系的学生中抽调了一大批学生，在北京广播学院开办了一个世界语专业班，培养出一批世界语人材。当时我们以为全国的世界语运动从此可以打开局面了。不料到了一九六六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四人帮”把学校教育搞乱了，在十一所大学里的世界语教学工作被迫停顿。今天我们缅怀陈毅同志对世界语工作这种热情的关怀，不能不感到我们还没有实现他生前的愿望，而深深感到不安！

事隔十六年后，一九七九年夏天我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讨论和研究了开展世界语工作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努力工作，不辜负陈毅同志那样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我们世界语工作者的期望，把中国的世界语运动逐步开展起来，使它更加活跃，不断向前发展。

李奈西：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副秘书长

哥本哈根去来

——记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的人们

陈 原

哥本哈根……

汽车从飞机场往市中心飞驰……尽是平滑的柏油马路，路旁翠绿树木，矮树丛中红红绿绿的花朵，迎面而来象发疯似的汽车，戴着白色钢盔的普通机器脚踏车驾驶员，骑自行车的母亲领着骑自行车的小女儿，还有在路旁安详地散步的女人带着她的巴儿狗或者大狼狗……哥本哈根到了。

八月初，哥本哈根（北欧最大的城市之一）以仲夏的姿态来接待它的客人们，在欧洲，这时还是休假的季节；而丹麦却是欧洲的游览区，只要知道四百多万人口的丹麦，每年照例接待至少四百万游客的事实，就可以推论这个首都是多么忙碌而又多么好客了。北欧的天气这时早晚已经有点凉意，但是中午的阳光却还带着夏日的炎盛。丹麦的海风调节了这里的天气：不太冷也不热。可是，忽然天气泛起几片乌云，一下子人们便得淋雨。这时姑娘们从手提包里掏出两寸多长的小红包，展开一幅人造纤维的防雨帽披在头上，男人们早已索性把雨衣当做夹衣穿，因此下雨他们并不介意。你正发愁这雨要下到什么时候才停呢？然而只不过吃一顿饭的功夫，却又雨过天晴了。哥本哈根本来是一个整洁的城市，

下过微雨或者阵雨之后，空气便更加新鲜，有时好客的丹麦朋友多少感到这些夏日的骤雨会给远来的客人造成某种程度的不便，偶尔也找个机会陪罪似的解释道：“今年真特别，八月里雨水格外的多。”其实所有的地理书都记录得明明白白的，哥本哈根一年到头的雨量几乎集中在八月里。游客们坐在四面都是玻璃的游览汽车里在城外兜圈子观光，他们本来不在乎是晴是雨，反正车子里的导游一样地用他那单调的声音通过扩音器解释着周围的景物……

世界语·活着的语言

哥本哈根今年八月却还欢迎两千多个来自四十三个国家的世界语代表。飞机，国际列车，海船，公路车，长途旅行的汽车，机器脚踏车，一直到自行车，在八月的最初几天里，从四面八方把两千多人送到哥本哈根来——其中也包括我们从北京飞来的三个。两千多人在这样的游览季节来到这样好客的游览城，本来不算怎么一回事，但是这两千多人终究很快就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因为两千多人不光来游览，还要举行第四十一届的国际世界语大会，两千多人本来说着七八十种民族语，可是到这里来没有一个带着翻译，他们自由地说着完全能够相互了解的共同语言：世界语。

年青的读者可能完全没有听过“世界语”这个名字，三十岁以上的人们会道知它是一种国际辅助语，但是不论怎样，人们总是怀疑：这是不是已经变成死魂灵啦，或者仅仅是一种僵化了的符号。哥本哈根的国际世界语大会答复了这个问题：六十九年的实践使这个以民族语为基础的世界语不但没有死，而且日益接近成熟的境界。人们可以用这种语言

来作种种生活上的安排，人们可以用世界语争论甚至谈情（据说爱情的语言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语言），匈牙利诗人尤利·巴基在那里朗诵了他的诗篇“人民的匈牙利在多瑙河畔”；科学家在大会上宣读了十多篇用世界语写成的专门的学术论文。只要你接触一下这个特别的国际会议，一切怀疑都会化为乌有。正如高尔基当年为世界语辩护的时候说过：保守主义者认为世界语是乌托邦，可是活生生的按着规律发展的现实，慢慢地然而有力地驳斥了保守派的这些论证。

语言的隔阂是各国人民直接接触的一个难题。人们总不能满足于仅仅互相用各种语言喊叫“和平”；也不能仅仅紧握着彼此的双手就能表达一切感情。但是在世界语的国际大会上都解决了这个问题。随便一围拢来就是十几个民族。同桌吃饭的一下就来自十几个国家——谁都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没有一点困难。比方说开幕式那天，朋友们都嚷着去吃中国菜，于是一窝蜂把我们带到哥本哈根最热闹的“东街”北京餐馆。坐下来一看，一个波兰细菌学家，一个保家利亚工会活动家，一个南斯拉夫职员，两个瑞典小姐，一个奥地利的教员……大家就用世界语来闲扯，自然而然从介绍中国菜到怎样用筷子，从吃到家常，从每月的薪金到老婆孩子……两个瑞典小姐对于我们的筷子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对中国菜那就更不用说了），她们终于向餐馆买了两双筷子。第二天，S小姐还兴致勃勃地带了三个同志来看我，劈头一句是：“你瞧，我已经教会了三个同志用中国筷子吃东西了！”她的“学生”——一个挪威人，一个芬兰人，一个荷兰人轮流和我握手，少不得又是一番谈笑，评论着刀叉、筷子，又是各种民族的生活方法……

普通人……

这个国际大会之所以别致，还不仅因为大家说着同样的语言，就是参加者本身何尝不别致呢？这完全是各国普通人的国际会议，没有一点架子，无须装腔作势。全是爱和平、爱生活的普通人。就拿那天我们到克隆堡参观哈孟雷特古堡时接触过的人来说吧：在汽车上和我同坐一排的是一个芬兰铁路局的小职员，他刚刚十天前开始退休了，跟我一起走进黑漆漆的地下窖子的是西班牙巴塞罗那来的小姐，电车公司的女职员，在草坪上和我细声谈话的是德国马赛城的工会运动者（他说他是德共领导的总工会活动分子）；吃中饭时，坐在我身边的是一对英国夫妇，他们虔诚地频频祷告，感谢上帝赐给他们这样美好的丹麦午餐，原来他们的职业是牧师；不声不响微笑着让我给他拍照的荷兰小姐仿佛是一个恬静的家庭妇女，和德国来的几个女学生跳跳蹦蹦，刚刚相映成趣，意大利的大学教授滔滔不绝的谈其罗马，但是丹麦奥尔堡火车头工厂的一个熟练工人却诚恳地向我谈关于中国的事情，要我写下地址却又把她的钢笔忘记在我这里，害得我到处找她的那位丹麦姑娘，是一个小城镇的小学教员。走出城堡的时候，我们并排三个人，一个保加利亚的共产党员，被关在希特勒集中营里好几年，她有宣传的习惯，她宣传开了：“人民自己双手建造的宫殿，却被暴君用来囚禁人民，多么残酷的压迫呀，现在可完蛋啦！”同行的一位瑞典母亲带着自己的小女儿，她是普通的售货员，仿佛听进去了，仿佛又只是描绘她自己的感受：“打仗多么可怕呀！我真讨厌那些爱打仗的家伙！”这时西德一个电机工厂的工程师走过

来，笑嘻嘻地要求我们让他拍照，他用半个火柴盒大小的照相机给我们几个人照了两张相片。奥地利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前天我们见过面，现在跑过来问文字改革的事情了……就是这样，不同的国度，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政治信仰，不同的宗教信仰，……然而绝大部分是劳动人民，真正的老百姓，他们学会了世界语，带着朦胧而美丽的一种理想——不要战争，要相亲相爱地生活，要和平，要彼此间象个朋友似的接触。

整个大会就是这样的气氛下举行的。我们——各国老百姓能够直接接触，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和起码的出发点——和平。

喜欢中国，但是不了解它

难怪我们这三个中国代表（叶籁士、陈原、张企程）受到了大家友好的欢迎。这友好的欢迎从我们还没有进入大会会场报到那一刹那开始，一直继续到大会结束之后我们快离开哥本哈根为止，没有一刻的间断。我们经常被各国的代表所包围。去饭堂吃饭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两个人好不容易从重围中脱出，第三个人却还被人们拖着不放。第三个人结束了他的交谈，头两个人又已经重新陷入重围。东方人参加大会的不多，因此人们很容易发现我们。一发现我们，谁也不肯放过。

接近我们的人是怀着各种各样的动机的：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如果你明白这个大会是真正老百姓直接接触的国际会议的话，有的仅仅是为了收集签名，他们从来没有收集到中国人的签名，而中国又是世界上那么重要的大国，有的单纯为了向辽远的东方古国致敬，有一个西德教授很怀疑中国

人能不能发正确的语音，跟我们谈过话之后，他已经解决了自己的传统的偏见。但是不少人实在对中国有好感，要多了解一点这个对他们说来是个谜样的新国家。有一天，一个芬兰中学老教员，好容易找到一个机会和我单独谈话，他是这样客气和和蔼，礼貌彬彬，使人自疑身入君子国了，虽然如此，但是仍然感到了他的真诚。他使用了世界语里面所能使用的最亲切而又最客气的字眼和句法，探问着关于中国青年有多少机会能够受到教育——他知道的不少，他知道芬兰和中国之间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和进出口的物品。当他了解了我们解放后，中小学迅速增加时，他就紧握着我的双手，以一个慈祥的老教师几乎有点发抖的声音向我祝贺，显然他感到了幸福。并不是所有的普通人都对严肃的问题感到兴趣，但是即使琐碎的生活问题也反映了人们的想法。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国家的中年男人指着我的衣服问道：“这衣料不坏呀，中国也能出产上等衣料么？”我坦白告诉他：“能。我穿的衬衣是中国绸，可是我的上衣是英国呢，因为我们并不拒绝购买外国的东西。”他很觉得有意思，连声说我懂、我明白……这时收集签名的狂热者又来了，无怪有的严肃而年青的人就很不满意这些穿插，不时刺他们两句，人们向我们提出的最普遍的问题是，中国人口这么多，粮食够不够？是否经常发生饥荒？知识分子显然十分关心我们的文字改革，挪威一个大学生对这件事情感到很大的兴趣，而且令人吃惊的是他竟知道得不算少。然而北欧许多老百姓只是从赛珍珠和林语堂的书中知道中国，从知识界一直到家庭妇女，他们仿佛都多少读过这两个人的东西。……忽地一个意大利中学教员带着一个录音机，请求我说几句话，表明中国的老

百姓向意大利人民致意，好让他带回意大利去。他说我找你找了几天啦，好容易找着了。于是我们就在走廊里找电门，可惜没有找到，这位意大利人上楼去找，也没找到，他失望而回，只好相约另外一天。在大会饭厅吃饭的时候当然也是接触的机会，就是在附近的馆子吃饭也免不了遇到“袭击”。有一天另一个意大利人就闯到我们饭桌跟前，道了歉，然后互相交换了纪念品。一直到大会闭幕那一天，两个德国大学生找到了我们，他们说：打从第一天起就知道有三个中国代表来了，老是碰不上，碰到了一个日本人，他说他自己曾经和你们交谈过，直到现在，到底找到了，仿佛找到了什么奇宝似的！大会闭幕后，离开哥本哈根的前一天，我们在城里最大的百货公司里买纪念品，忽然走过来一个自称是比利时的姑娘，用银铃似的声音告诉我们：早就想向中国的同志致敬，可是在开会期间你们老是被人包围，我挤不上，现在终于和你们在一起了！其时参加大会的一个美国普通人也走过来与我交谈……

丹麦人……

我还没有提到丹麦人普遍对我们中国表示的好感。我们到哥本哈根的第一天傍晚，在海滨的一个小饭店里，在那里喝茶的几个家庭妇女一看见我们进去便招手致意。也许他们看过我们的艺术表演吧，也许他们只是觉得应该这样接待中国人。到我们归去的时候，一部疾驰的汽车里一对年青丹麦夫妇也举手向我们频频相邀。丹麦有许多私人小房屋，往往租一两个房间给游客暂住（我们便是住在这样的屋子里的）据说前几年人们不太敢租给中国人住，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人，人们说：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来自新中国的可